

史唯物的論



恩
格
斯
著

新 漢 出 版 社 印 行

146
G52

史 的 唯 物 論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恩 格 斯

發 行 者 新 漢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新 漢 出 版 社

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五 分

外 埠 酌 加 郵 費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五 月 初 版

目次

史的唯物論

一

法蘭西唯物論史

三〇

馬克思的唯物論及辯證法

五〇

101135

史的唯物論

……我都知道這本小冊子的內容將不爲英國讀者的大部分所歡迎。（註）但如果我們大陸上的人稍爲顧慮到英國的「尊敬」即英國的道學先生的習俗的成見，則我們所處的地位比現在還會更壞。這本書所辯護的是我們所稱爲「史的唯物論」的。而唯物論這個名字對於英國讀者的大多數是刺耳的噪音。「不可知論」尚在流行，唯物論則完全不可能。

（註）這是「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發展」英譯本一八九二年的序文。著者從英文譯成德文。前頭的四頁省略了，牠裏頭所包含的只是些註解，這在德意志是已經知道或不能引起興趣的。「新時代」，第十一年第一卷，一八九二年，十五頁以下，四二頁以下（恩格斯）

可是從十七世紀起一切近代唯物論的搖籃不在別的地方而在英國。

「唯物論是大不列顛的嫡子。牠的經院派學者登司考脫（Duns Scot）已經問過，物質是否能思維。

要成就這個奇蹟，他求助於神底萬能，即他強神學來宣傳唯物論。他還是一個唯名

論者。在英國的唯物論者們，唯名論是主要的要素，像牠一般地是唯物論之最初的表現一樣。

英國唯物論之真的祖先是培根（Bacon）。對於他，自然科學是真的科學，而感性的物理學是自然科學底最重要的部分。亞那薩哥拉斯及其種子（Homoiomerien）和德謨克利特及原子（Atmen）常是他的威權。依他的學說，感官是靠得住的，是一切知識的源泉。科學是經驗的科學，牠的成立在於以合理的方法適用於感官所給與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及實驗，這些是合理的方法之主要條件。在物質底固有的性質中運動是第一個且是最優越的，不僅當做力學的及數學的運動，而且是衝動，生命力，彈性力，——借用波墨（Jakob Behme）的術語——物質底苦惱。後者之原始的形式是有生命的，個別化的，固着於牠的，產生種的區別的，本體力。

在唯物論底第一個創始者的培根，唯物論還素樸地包孕着一切方面的發展底萌芽。物質以有詩意的感官的光輝對全人類發笑。反之，這個格言式的學說還充滿了神學的矛盾。

唯物論在其發展的進程中成了偏狹的了，霍布士（Hobbes）是培根的唯物論之組

成者。感性失了牠的花輝，而成爲幾何學者底抽象的感性了。物理的運動做了力學的或數學的運動之犧牲，而幾何學被宣稱爲首要科學了。唯物論成了厭惡人類的東西。如要在自己的領域內能克服厭惡人類的沒有肉體的精神，唯物論應把自己的肉體斷削而變成禁慾的修道士。牠出現爲悟性的產物，但牠也發展了悟性之毫無顧忌的結果。

霍布士從培根出發來證明：如果感性給與人類以一切的知識，則直觀，思想及表象等等都不外是多少脫去了感性的形式的感覺世界之幻像。科學只能替這些幻像定名字。一個名字可以適用於許多的幻像。并且名字也可以有名字。但這是一個矛盾：一方面在感官世界中求一切觀念的起源；他方面又主張一個名詞不只有一個名詞的意義，在被表象的常是個別的事物以外還有一般的事務。一個不具形體的實體與不具形體的形體一樣，同是一個矛盾。形體，存在及實體是同一的實質理念。我們不能把思想從思維的物質分開，牠是一切變化底主體。無限這個字是沒有意義，如果這不是表示我們精神底不以止境的能力。因爲只有能被知覺的物質的東西才能知道，所以我們關於神的存在什麼也不知道。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是確實的。一切人類的情慾都是終止或開始的力學的運動。衝動的目的物是善。人類與自然一樣，依從同樣法則。權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士把培根集大成了，但他的一切知識和觀念底起源都是在感覺世界這個根本原理却没有更進一步地確證。

洛克（Locke）在他的人類悟性起源論中把培根和霍布士底這個根本原理附以確實的基礎。

像霍布士除去了培根的唯物論之有神論的偏見一樣，高林士（Collins），多威爾（Dodwell），高華德（Cowart），哈德烈（Hartley），蒲黎斯德利（Priestley）等也打破了洛克的感覺主義之神學的境界。有神論至少對於唯物論者們是不超過免除宗教的一種便利的方法。（註）

（註）馬克思恩格斯共著，「神聖家族」，佛蘭克福（Frankfurt M）一八四五年版，二〇一到二〇四頁，恩格斯。——（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遺稿集第二卷，二三五到二三七頁）

關於近代唯物論之英國的起源馬克思是這樣寫着。如果現在的英國人特別不以馬克思對於他們的祖先所下的判斷爲然，那我們只有替他們惋惜。但這還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培根，霍布士及洛克是法國唯物論者底一切先榮的學派之祖先。雖然在陸上和海上德國人和英國人

都戰勝了法國人，但法國的唯物論者却使十八世紀特別成了法國的世紀；而且這一直到那個加榮冠於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之前也是一樣，我們外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都正在努力要同化於她的結果。

這又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有教養的外國人要在十九世紀中葉住在英國，他常要看到一件事，這就是英國「可尊敬的」中等階級之宗教的頑迷和愚蠢。當時我們都是唯物論者或很急進的自由思想家，我們想不到差不多一切有教養的英國人都相信一切不可能的奇蹟，就是像卜克蘭（Buckland）及曼特爾（Mantell）這樣的地質學家也歪曲他們科學的事實，以致不太與摩西的創世紀之神話相衝突。我們更想不到要找敢把他的理性應用到宗教的事件的人須要到沒有教養的人中，要到「離齷的人羣」中，到勞動者中，特別是要到歐文派的社會主義者中去找。

但此後英國就「開化」了。一八五一年的博覽會撞響了英吉利島國底閉關性之吊鐘。英國在飲食，習慣及觀念上漸漸國際化了，國際化了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我更加希望某種英國的習慣在大陸上也得到同樣的一般的採用，像別的大陸的習慣在英國一樣。青菜加油的食法在一八五一年以前英國只有貴族知道，現在已傳播於全英國了。但這種傳播也跟著一個大

陸對於宗教事件的懷疑論之不可避免的傳播。不可知論固然沒有像英國國家教會一樣的這樣起勁，但關於尊敬這點，差不多立在與侵禮教派同樣的地位，而且佔了比救世軍還要高的位置。因此，我只能作這樣想，對於從心坎中憐憫和咒咀這些非信仰底進步的多數人們，這會是一種安慰。知道這些新製的觀念不是發源於外國。沒有印上「製於德國」(Made in Germany) 這個標號，像許多別的日常用品一樣；反之，這是起源於本來的英國，而牠的兩百年前的英國的創始者比他們現在的子孫是走了更長遠的道路。

事實上，不可知論不是忸忸怩怩的唯物論是什麼呢？不可知論者的自然觀徹底地是唯物論的。全自然界都為法則所支配，絕對排斥從外部來的影響。但是，不可知論者慎重地附加說，我們不能證明在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以外的一個什麼最高的本體之存在或非存在。這個保留在拉蒲拉士(Laplace)很驕傲地回答拿破崙的詢問時或許有牠的價值——拿破崙問，為什麼在大天文家的「天體力學」一書中連造物主的名字都不提起？拉蒲拉士回答說，「我沒有用這個假設的必要」。但現在我們關於在發展中的世界全體之思想形像就絕對沒有留給造物主和支配者的餘地。如果人們要假定一個屏出於現存的世界以外的最高的本體，則這自身是一個矛盾，而且據我看來，還是對於宗教的人們底感情的一種無來由的侮辱。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同樣地承認一切我們的知識都立在我們的感官所感受的傳達之基礎上。但他接着說，我們從何知道我們的感官是否能給我們以一個牠所知覺的事物之正確的模象？他更告訴我們：如他說及事物或事物底性質的時候，則實際上他說的不是這些事物及牠的性質本身（關於這些，他不能知道一點確實的東西），而是這些事物及性質所給與他們感官的印象。這的確是一種理解的方法，但如只是單純的辯論，則這方法似乎是很難得達到的。可是人類在辯論以前，他就行動。「在開初就是行動」（Im Anfang War die Tat）。在人類的才智發見這個困難以前，人類的行動早就解決了這個困難。布丁的籍明是在吃這個布丁（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is in the eating）。當我們依照我們在事物中所知覺的性質而使用這些事物的時候，當這個時候，我們便是在確切地證驗我們感官知覺底正確性或非正確性。如果這些知覺是不正確，則我們關於這樣的事物底可使性的判斷也一定是不正確，而我們使用牠的企圖也一定會失敗。但如我們達了我們的目的，我們知道這事物是與我們關於牠的表象一致而達成了我們使用牠的目的，如果是這樣，則這是一個積極的證據，證明了我們關於事物及牠的性質的知覺在這個範圍以內是與有在於我們外部的實在一致。反之，如我們知道我們是失敗了，則大體上我們不久也會發見失敗的原因；我們就會知道爲

我們證明的基礎的知覺不是牠自身是不完全及皮相的。便是牠沒有經過事實的證實而與別的知覺底結果混連了。只要我們正確地訓練和使用我們的感官，又在爲正當地形成和利用了知覺所規定的範圍內保持我們的行動方式，則我們就會知道我們行動底結果證明了我們的知覺與被知覺的事物底客觀性之一致。沒有過一個這樣的場合使得我們達到這樣的結論：我們的科學地規制了的感官知覺在我們的腦筋中產生關於外界的表象，而這些表象性質上是與現實乖離，或者在外界與我們的感官知覺的中間有一個本來的不可調和性。

但現在又來了一個新康德派的不可知論者，而且說：固然，我們能够知覺一個事物底性質，但不能用什麼感官過程或思維過程來把握事物自身。這個物自如（Ding-rtn-zech）是在我們的認識底彼岸。關於這點，黑格爾早就已經答覆了：如果你們知道了一個事物底一切性質，則你們也知道這個事物自身；再沒有什麼了，除了這個事實，即所說的事物是存在於我們的外部這個事實，只要你們的感官一提示了你們這個事實，則你們就認識了這個事物底最後的一滴，即康德底那個有名的不能認識的物自如。現在我們還可以附加的說，在康德的時代，我們關於自然物的知識是足夠零細而不完全，以致容許在這個的背後還要假定一個別的神祕的物自如。但自此以後，因科學底巨大的進步這些不能把握的事物都一個一個的被把握

，被分析，且被再生產了。而我們所能製造的，我們就不能再視為不能認識的，對於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化學，有機的實體是這樣的神祕的事物。現在，我們從化學的原素一個一個地知道，這些有機的實體，而且不用什麼有機的過程而能製造，固然，我們與最高的有機的實體即所謂蛋白質體底構造之精確的認識還離得很遠，但充全沒有理由，為什麼在幾世紀以後我們不應達到這個認識，且藉這個認識來製造人造的蛋白質。但如達到了這點，則我們同時也創造了有機的生命，因為生命，從牠的最低的形式到最高的形式，不外是蛋白質體之正當的存在樣式。

但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一經做了這個形式的保留，則他的說話和行動就完全像一個無恥的唯物論者一樣，——他本來就是一個無恥的唯物論者。他或許會說：就我們所知道的物質與運動，或現在人們所說的能力是不能產生，也不能消滅，但我們沒有證據說這兩者不是是一個什麼不知的時代產生出來的。可是你們試一把這個自在一個特殊情形下反轉來對付他，則他馬上就會避開你們而且使你們靜默。抽象地他承認唯心論底可能，而實際上他關於唯心論什麼都不想知道。他會對你們說：就我們所知道及所能知道的來說，沒有什麼世界無體底創造主或支配者；就我們所觀察得到的來講，物質與能力是不能創造，同樣也不能毀滅；對於我們，思維是能力底一種形式，腦筋底一個作用；一切我們所知道的都歸到物質的世界是

爲不變的法則所支配這個事實——等等。所以，只要他是一個受了科學訓練的人，只要他知道一點什麼東西，他就是一個唯物論者。在他的科學以外，在他所不在行的領域內，他把他的無知翻譯成希臘文，而名之爲不可知論。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似乎是確實的：縱使我就是個不可知論者，我也不能把在這本書裏所述的歷史觀稱爲「史的不可知論」。信仰宗教的人們會笑我，而不可知論者會憤怒地質問我，我的不是想嘲弄他們。所以我希望英國的「尊嚴」——德國人稱爲庸俗之人——也不應太過於驚恐，如果我在英文中，像在許多別的文字中一樣，用「史的唯物論」這個名字來表示那種歷史觀，這種史觀是在社會之經濟的發展中，在生產方法及交換方法之變化中，在社會之起因於此的階級分化中及在這些階級底鬥爭中去求一切重大的歷史的事件之最後的原因及決定的推動力的。

如果我證明史的唯物論就是對於英國的俗人之尊嚴也能有利益，則人們或許更會允許我用這個名詞。我已經指出了這個事實：在四十年或五十年前，每個住在英國的有教養的外國人定會遇到英國的「可尊敬的」中等階級之宗教的頑冥及固執，而使他感着不愉快。我現在要說明的是當時的可尊敬的英國中等階級也并不完全像有智識的外國人所看到的那樣愚蠢。

他們的宗教的傾向會能說明的。

當歐洲脫出中世紀時，日益增長的城市資產階級是牠的革命的要素。在中世的封建制度中所奪取的曾經承認的地位，現在對於牠的擴張力已經是變為太狹小了。資產階級之自由的發展已再不能與封建制度相調和，封建制度必須要沒落。

但封建制度之偉大的國際的中心是羅馬天主教（加特力克）教會。這教會把雖然有內部戰爭的封建化的全西歐統一成為一個大的政治的全體而與分離的、希臘教的世界及回教的世界對立，牠在封建制度之上飾以神賜的聖光。牠仿封建制度創成了牠自己的教職政治，終於成了一切封建諸侯中的最大的一個，因為至少一切加特力克教的土地之三分之一是屬於牠的。要在各國個別地打擊這世界的封建制度以前，應先把牠的中心的神聖化了的組織破滅。

但與資產階級底進展同時，科學底強有力的飛躍也一步一步地發展了。天文學，力學，物理學，解剖學及生理學重新又被著究了。資產階級為要發展牠的工業的生產，需要一個研究自然體底性質及自然力底運動方法的科學。但一直到現在，科學只不過是教會底馴順的婢女，不許超過為信仰所定立的境界——一句話，牠是一切，只不是科學。現在科學向教會反叛了；資產階級需要科學，且參加了這個這個反叛。

這裏，我只說到正在進展的資產階級必然地要與現存的教會起衝突的諸點中之兩點；但這已經足夠證明：第一，在奧加特力教會底權力地位的鬥爭中最有直接關係的正是這個資產階級；第二，當時一切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都必須帶上宗教的衣裝，且鬥爭必須首先就向着教會，但如從大學及城市商人發出了戰爭呼聲，那一定要在農村羣衆中，在農民中得到強有力的響應，當時的農民到處都在與他們的宗教的和俗世的封建諸侯作堅苦的鬥爭，而且是爲着生存本身，

歐洲資產階級對於封建制度的偉大的鬥爭在三個偉大的決定的戰爭中形成了最高點。

第一個是我們所稱爲德國的宗教改革。響應了路德（Luther）底對教會的反叛之呼聲的有兩個政治的暴動：第一是爲西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所領導的一五二三年的小貴族的暴動，次之便是一五二五年的偉大的農民戰爭。這兩者都被厭伏了，主要地是因爲最有切身利益的城市資產階級底不堅決，這不堅決底原因我們在這裏不能夠研究。從這時候起，這鬥爭變成了個個的諸侯與皇帝的中央權力間的鬥爭，結果，使德意志二百年間從歐洲政治地活動的諸國之外消失了。路德的宗教改革的確形成了一種新的宗教，而且是這樣的，絕對專制政體所正需要的新的宗教。東北部德意志的農民才一信「路德教，他們也就從自由

人降爲農奴了。

但路德所失敗的，喀爾文（Calvin）却成功了。他的教義正適合於當時最急進的資產階級。他的天選論（Gnadenwahl）正是這個事實底宗教的表現，即在商業世界中的競爭成功或破產是不依屬於個人底活動或手腕，而是依屬於不爲他所支配的環境。「所以這不在於某個人底意志或經歷。而是在「優越的然而不能知道的經濟力之「憐憫」。而且這在一個經濟的變革的時代，特別是真確的，在那個時代，一切舊的商業路線和商業中心都爲新的所壓倒了，美洲和印度在那時代開放於世界了，就是那最寶貴的經濟的聖物——金和銀的價值——也在那時代起動搖而趨於崩壞了。關於這點，喀爾文的教會制度是完全民主的和共和的；神的王國既然共和化了，這世上的王國那還能隸屬於帝王，主教及封建的諸侯嗎？如德國的路德教成了德國的小諸侯手中的馴順的工具，則喀爾文主義在荷蘭創立了一個共和國，又在英國特別在蘇格蘭創立了許多強有力的共和黨。

資產階級底第二個大暴動在喀爾文主義中完全找到了牠的鬥爭理論，這次暴動是爆發於英國。城市的資產階級自己也加入於這個運動，鄉村的中農（Yeomanry）使鬥爭得到了勝利。這是非常奇怪：在一切這三個資產階級的大革命中，農民供給軍隊，贊助戰爭，而農

民又正是這個階級，即在勝利後因這個勝利之經濟的結果最確實地要毀滅的階級，在克林威爾（Cromwell）一世紀以後，英國的中農就好像消滅了一樣。但無論如何，只因為中農和城市底平民要素的參與，這次鬥爭才能達到最後的決定的勝利，才能把查理十第（Charles I.）推上斷頭台。爲要把資產階級底這些很有收穫的勝利果實得着保障，就一定要使革命特別超過其原來的目的——完全像一七九三年在法國和一八四八年在德國一樣。這事實上似乎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法則之一個。

在這個革命活動底過火後接着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反動，這反動也遠越過了牠自身的界線。經過了許多動搖之後，終于也確立了一個新的重心，且這重心做了更向前發展的出發點。英國史的偉大時期英國的庸俗之流竟稱之爲「大叛逆」，而隨後的鬥爭僅得到了一六八九年的比較微小的事件這個結果，可是自由派的歷史家反稱之爲「光榮的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

這個新的出發點是正在拾頭的資產階級與從前的封建的大地主間的妥協。這些封建地主雖在當時和現在都稱爲貴族，其實早就已經在轉變爲——路易非立普（Louis Phillip）在法國許久以後才做到的——國家底第一個資產家。這是英國的幸運：舊的封建貴族都已在舊